

◀ (上接 14 版)

识。人们只知伊斯兰有恐怖主义，而不知其他；套用阿伦特的话，“全部真相是”，以某种伊斯兰色彩标明自身的恐怖主义集团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塌陷地带，剑指世界历史中的一切异质性交往事件及其政治决断。

“对话”和“交往理性”强调异质“他者”的在场，那么，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政治体的绝对他者，是更符合多元对话，还是可能将其毁灭？黑格尔意义上的对话——相互承认的法权，这场对话是场旷日持久的争斗，当争斗决出胜负，对话终结，新的争斗开始就是新的对话起航。犹太人问题解决了（以色列建国），犹太人问题又来了（伊斯兰恐怖主义与犹太恐怖主义有何逻辑差异？）。考虑到世界历史的生死对决时刻，维罗里《从“政治”到“国家理由”》（中译本为《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在探讨古今“政治”变迁后，专章研讨阿伦特的“公共”概念。

过去与未来之间

阿伦特关心古今之变，她仍有一丝期望——期望在人世不古的时代重拾古代的光荣。她看好美利坚革命，法国革命虽“大”，却只带来解放，没有迎来自由。无怪乎罗伯斯庇尔感叹：“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将逝去，因为我们错过了自由立国的时刻。”美利坚独立革命则为人们带来了自由，开启“伟大新事序”（*novus ordo seclorum*）。但1970年代的阿伦特也感觉美利坚一天天坏下去。她在波士顿二百周年纪念演讲中将“大赦”（*amnesty*）与“健忘”（*amnesia*）一起谈，来处理摩根索等反越战人士的态度。

阿伦特已经逝去四十余年。如果美国的政治正确是做一个反对种族歧视、宽容各族裔的大熔炉，那特朗普显然不符合美国政治正确。但他却抓住了在美利坚帝国的转折点——就像1970年代越战拖垮了美国一样，世界布防和民主推进拖垮了奥巴马时代的美利坚帝国。特朗普要做的无非是捍卫一条根本的政治原则，通过敌我划分重塑美利坚共和国的“国家”定位和国家利益；像尼克松联中制苏一样，特朗普可能使用联俄制中的方略，一边捍卫世界帝国统治权，一边恢复美利坚本土的国家利益。在这一意义上（当然

也仅限于这一意义），阿伦特看到的日益衰落的美利坚有可能迎来复兴。

穿越时空和语言的阻隔，阿伦特五十几年前的作品译成中文，遂成为中文世界中的一部作品，我们愈加感受到一种力量——“作为未来的过去”：

自由的光顾不是因为他们反抗了专制和比专制更糟的东西（对于盟军的每个士兵来说，现实就是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变成了“质疑者”，首先向自己开炮，进而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位于他们之间的、自由得以展露的公共领域。（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2页）

阿伦特从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中摘取了一则寓言：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道路。他跟这两个敌人交战。准确地说，第一个对手支持他和第二个厮打，因为他想把他往前推，同时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但这不过是理论上如此。因为不仅仅有两个敌人在那儿，他也在那儿，有谁真正知道他的意图？其实他的梦想是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这就需要有一个比曾经有过的任何黑夜更黑的夜晚——跳出战场，凭着他在战斗中的经验上升到一个裁判的位置，旁观他的两个敌人彼此交战。（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5页）

那些本该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为何重新归来？德国哲人先后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放光彩。在21世纪，伟大的中国需要阿伦特，译介阿伦特是为中华文明带回某种思想的可能性，以及某种特殊文明-共同体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德国思想家韦伯（Max Weber）在一战之后看到的时代状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一生不属于任何派别的阿伦特当然认可韦伯对时代精神的判断；但当她读到韦伯重振德国的非常段落时，自觉要保持距离，隐约感到其中暗藏杀机（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第170页）。阿伦特频繁征引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用这句话来结束这篇纪念阿伦特的文章再好不过：“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都没有过去。”（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第8页）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教师）

汉斯·摩根索对阿伦特的纪念

文/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译/董成龙



汉斯·摩根索
资料图片

死亡是对人生经历的终极一击。有些事虽然让人无法接受，甚至厌恶，却是不可避免的：有一天，这种非凡的意识及其神秘的复杂性会烟消云散，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能自觉地感知、使用意志和行动的生物突然停了下来，双眼紧闭，声音不再，而等待大脑的要么是火烧，要么是虫咬。所以，相信某种不朽并非又一种迷信——我们口头尊奉却不再相信的迷信。我们无法说服自己承认：非凡的意识只是黑暗中的闪光，只在一瞬间照亮了这世上的某个角落，然后像当初发现它一样离开它。

如果亡者毫无预兆地突然去世，接受死亡困境就尤其辛酸、苦闷。因为阿伦特如此机警，知晓人世，了解各种事件的意义以及语言世界和文字世界显露的秘密，她本性应该毫无畏缩地面对可知的死亡。

第一次接触阿伦特的人，都会震惊于她的思想活力，迅速闪烁，有时简直太快，她在寻找和发现人与事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的含义与关联。与阿伦特详谈过的人，都会震惊于她丰富的知识。她对古今哲学文本、伟大小说和诗作都如数家珍。她既欣赏作为诗人的奥登，也欣赏作为人的奥登。她喜欢讲奥登在她公寓里的故事，奥登身着破烂，阿伦特劝说他一起去名人商店换一身新衣服。

她的这颗心，了解几乎全部西方文明（虽然她对舞蹈和现代艺术不感兴趣），她的这颗心受一种激情推动，而这种激情的目标就是思考其本身。其他人或许玩牌、赛马以自娱，而阿伦特享受的则是思考。不过，只有在重大条件下，下面这个类比才是正确的：她不与思想做游戏，而是异常严肃地对待它们。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她的作品风格中，尤其表现在她的授课风格中。她在讲坛上讲授的是一种智性激情，对她而言，讲授她以为的真理，或者至少是批驳被当作真理传播的谬误，是一种高尚的使命。她热爱教育学生，也受到他们的爱戴。

凡见过阿伦特的人，都对她有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不过，除了朋友对她的怀念，她还为后人留下了什么？她为过去和以后的读者留下了什么思想，值得让她获得持久的思想关注？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提出并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阿伦特是何种作者？读过《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人或许会以为她是个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

读过《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人会把她当作政治史学家；在《人的条件》中，读者面对的则是一位哲学家。翻阅《共和的危机》的读者面对的则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如果考虑到即将出版、暂时定名为《认知》（*Knowing*）、《判断》（*Judging*）和《意志》（*Willing*）的三卷本吉福德讲稿，人们会发现她是一位系统哲学家。

想根据流行的分类划定阿伦特是不可能的，这恰恰反映了她作品的本性。她可以被我们视作天生的智识人，对各种困扰人心并且貌似能被划分的事都有哲学反思。主题可以是人或问题——最好是用前者说明后者。因此，她就卢森堡所写的作品成了对魏玛共和国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析。她就奥登、本雅明、布莱希特、布洛赫和贾雷尔所写的文章则描摹了当代世界诗人的图景。

因此，她还就艾希曼撰文，旨在揭露在“平庸之恶”中达到巅峰的纳粹主义的道德本性。她还指出了下面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作恶者人格中所呈现的恶必定与所做的恶一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能会犯下大恶，甚至伟人也可能这样。

文明曾经禁止公民和政府使用暴力，在逐渐打破这种禁令的时代，阿伦特考察了暴力的本性。因此，她就某段历史中的革命撰文，那段历史见证了新旧国家中通过解体、革命或军事政变对各种秩序的破坏。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那部杰作中说：法西斯主义不是又一个僭主制（它可能比过去的僭主制更有效），而是一种“新政体”，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上的政府类型不同。她还说明：全能主义不只是当地情势所造成的脱轨，而是西方社会危机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智识倾向和政治运动中发现这些危机的根本。

阿伦特走向对不同问题的调查，其哲学和政治缘由是什么？鉴于她曾经受到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哲学训练，并与他们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人们定会仔细寻觅这两位现代哲学巨擘直接影响她的踪迹。当然，日后的吉福德讲稿能够就这一问题的哲学方面做出回复。她所反对的观点比她所赞成的观点更能界定其政治立场。无论意识形态色彩如何，政治狂热甚至还有政治教义，都不在她的政治思想模式里。她用人道主义和个体智性的批判眼光观察古往今来的政治场。因此，她欣赏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因此，她也不同意艾希曼审判所提出的某些问题。

与根据传统分类进行划分相比，更重要的是阿伦特作品中的总体智识品质。它们都记录着原创的深刻理智。熟知的概念和问题经过她精神的加工，就显得不一样了。她的论文是宏大的文学。有人就认为，她是爱默生和伟大英法散文家的杰出同伴。

让阿伦特思想发挥作用的是一种杰出的讽刺风格。随着她对英语语言的熟悉度增加，她就发展出了这种风格。她在波士顿二百周年纪念演讲中将“大赦”（*amnesty*）与“健忘”（*amnesia*）一起谈，来处理我们对反越战人士的态度，这是她最后一次拿出这种得体的礼物。

另一个例子就是她关于古里安（Waldemar Gurian）的文章，时值《黑暗时代的人们》重印和古里安去世。他是美国圣母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他最初是一位分析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研究者，被控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分裂精神。他是我俩的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通过他，我才在五十年代初与阿伦特会面的。她的文章是文学杰作，以描述、锐利和鲜活的文字重现了一个非凡人物的精神、灵魂和身体。我曾对她说：如果她的所有作品都被弄丢了，只剩下她关于古里安的文章，那也能确保她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

我怀有一个隐秘的想法：如果时候到了，她能为我做对古里安做过的事。她也曾对我说，担心我会先她而去。唉！她的担心没有实现，而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些人才是更值得可怜的人。（原文“Hannah Arendt 1906-1975”，刊 *Political Theory*, Vol. 4, No. 1 [Feb., 1976], pp. 5-8; 中译原题“缅怀阿伦特”，载董成龙编校，《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5。发表时有删节）